

# 朱子帶來的訊息

清華大學中文系

楊儒賓

## (一)

公元兩千年華人思想界的熱門人物居然是業已逝世八百年的南宋大儒朱子(1120-1200)，海峽兩岸的學者為了紀念朱子逝世八百週年，不約而同，分別召開了八次大型會議。大陸先行在北京、上海、上饒、武夷山召開四次會議；台灣的淡江大學、漢學中心、《鵝湖》雜誌社以及中國哲學會也分別和有關單位合作，召開了四次的國際會議。上述的會議主辦單位除了出論文集外，台灣哲學會主導的《台灣哲學雜誌》也擬推出一期朱子學專號，大陸其他各地區以及日韓學界想必也有相關的學術活動。一位學術人物在逝世八百年後，其思想竟然還能引發熾熱的討論，這絕不是偶然的事。

五四以來，朱子的形象一向不佳。吳虞之類的學者所要打倒的孔家店，一大半是經過朱子學派經營過的店舖，它不見得是先秦時期的老店號。從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以來，朱子的經學注釋成為官方奉行的御用標準，全國學子只有透過朱注的管道，才可以進入國家的文官系統。十四世紀末，韓國李朝建立，十七世紀初德川幕府躍上日本政治舞台，朱子學分別成為兩國的治國方略。某種思想一旦成為主流的思潮，它包山包海，解釋一切，並且規範一切以後，可以預期的，它一定會招來敵對的反彈聲浪。中世紀的歐洲教會，隋唐時期的佛教，都有過類似的遭遇。十九世紀中葉，海權大興，世變日亟，堅船利砲帶著大量的經濟商品，挾著相應的新興思潮，一波波的衝擊全球各地封閉的市場。在東亞，朱子學成為首當其衝的思想長城。一旦舊有的長城不再能保護原有的政經秩序以後，它很快的變成了詛咒的對象，它是挫折的象徵，也被視為絆住東亞人民向歷史邁進的絆馬繩。

朱子一定想不到他死後的命運竟然會這麼複雜，他大概沒想到：在他過世後不久，他的思想竟然會從被打壓的撒旦，搖身一變，成為國家的最高指導方針。他大概也沒有想到：他殫精竭慮、解行並進所證成的永恆真理，有一天竟會被視為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 (二)

朱子生在福建中部一個秀麗的小村莊，他是福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身上同時流動著最正統與最異端的血液，他的父親朱松是二程的三傳弟子，他

的老師劉子翬、李延平等人與朱松同門，所以也是洛學的正宗。朱子一生很自覺的以繼承洛學為己任，他全面的編纂前代理學大師的文獻，我們現在看到的周、張二程以及程門高弟的文集，大抵都經過朱子之手的整理。他一生站在他自認的洛學的立場，不斷與當時的各種思潮對話，甚至對抗。他不但批判教外的佛老，他也批判儒學內部的陸象山、陳亮、葉適。他不但在儒門義理的領域內意見特多，他對當時的各種文化領域，也都有議論。「氣吞萬理如虎」的辛棄疾一生目中無人，卻畏朱子如虎；「鐵馬秋風大散關」的陸放翁以國士自許，對朱子卻五體投地。在史學、詞賦、書法各個領域內，朱子也無一不涉及。朱子認為：不是他好辯，而是儒學原不只是哲學，它對人生有個全面性的關照，所以朱子必須讓儒門的義理深入到人生的各個角落，他就像永不退縮的戰士，胸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手持著性理的世界觀此惟一的武器，轉戰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戰場。而且，最後都收到豐碩的戰果。南宋以後的學問部門，經史子集，幾乎都脫離不了正統理學的色彩。

朱子理想的人格是文質彬彬、勁氣內斂的類型，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朱子畫像，也都是寬衣緩帶、雍容肅穆的儒者。然而，我們閱讀他的傳記及詩文，不難發現在他平靜的意識下，其實隱藏著深不可測的生機動能，這樣的動能不是表層的理性所能控制的。朱子批判佛老不遺餘力，但他卻會寫出「我來萬里騎長風，絕壑層雲洗我胸，濁酒一杯豪氣放，朗吟飛下祝融峰」的句子。他對一般文人吟風弄月的風氣頗不滿，但他本人詩文創作的動力卻很衝。乾道三年，他曾為了程伊川的學問的解釋問題，特地南行湖湘，拜會他的朋友張南軒，他們兩人及門生在論學之後，還相約共遊南嶽衡山，前後二十天。期間朱子作詩不斷，遊興奇高，事後，他還一方面很高興的將他、張南軒以及弟子林用中的詩合編為《南嶽唱酬集》；但一方面他又覺得這樣的行為未免流連忘返，有些逸軌了。其實，他的逸軌的行徑不只這次我們毋寧認為：逸軌是他的常態。他最好的朋友張南軒說朱子「會聚之間，酒酣氣展，悲歌慷慨」。張南軒個性平和，老是勸朱子改變氣質。但朱子身上流動的沸騰、好奇的血液是很難改變的。在散文、書法、史學甚至政治實踐的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朱子另一面自我，用他的話講，也就是「帶性氣」的朱子。

也正因為朱子身上同時兼具正統／異端、穩健／冒險、理性／直覺、方以智／圓而神的成分，他這份與生俱來的倔強衝動從來不曾被真正的銷毀過，所以朱子才可以深入到文化的各領域去作思想的冒險，我們能夠設想：一種沒有帶著生命衝動、形像思維的文學或藝術嗎？如果不是對超乎人文世界以外的宇宙奧秘或人生謎題有極深刻的關懷，朱子會深入佛老、甚至一般儒者不太願意碰的《參同契》、《陰符經》等方外祕笈嗎？

朱子的理智建構能力極強、深入性海的道德意識極濃；但他的生命底層同時又具有極深邃的直覺透視力，以及動能十足的生命本能，這兩股成分不斷在他身上

翻滾。他一生的志業無疑地遊移在「理」世界與「事」世界(或稱「物」世界、「器」世界)之間,如何使理事融合,顯微無間,這是他的思想最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如果將重點轉到朱子的人格來看,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朱子一生的經歷可以說在整合意識與無意識的關係,如何使意識的秩序力量與無意識的動能力量彼此支援,互滲互化,最後有機的融為一體。

### (三)

朱子是劃時代的人物,所謂劃時代,意指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的時代精神迥然不同,而朱子正是造成此差異的主因。

我們都知道朱子學是理學重要的一支,理學或稱性理學,理學是東亞世界幾百年來的主流思潮。理學家認為他們的學說平實,殊少駭怪之言。但理學就像任何大的哲學體系一樣,有一套特殊的術語,這些術語對知者來說,乃是進入理學世界的鎖鑰,但對門外漢來說,卻是阻礙他們進入理學王國的圍牆。

一般人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理」字的解釋問題。理一般具有條理、規則的意思,朱子說的「理」也有這樣的涵意。但更重要的,朱子認為這樣的理是先驗的,它是這個世界的規範因,它不會離開這個世界,但它又不屬於這個世界。朱子稱呼這樣的「理」為「太極」,這樣的理如果落在個體物上講,它又可稱作「性」。「性」、「理」、「太極」實質的意思上是一樣的,只是施用的場合不同,朱子認為它是真實的,它比可見到的現實世界還要真實(就像佛教徒認為涅槃世界比此世的顛倒妄想還真實)。但這種真實的理卻又不曾離開世界,這就是「不雜不離」的理世界,在現實世界上另立一個「遼闊潔淨」的理世界,這是朱子學最大的特色。

朱子學的另一個特色,乃是「理一分殊」的思想。朱子說:天下萬物,每一物必有一理;有一事也必有一理。任何形態的事事物物,都有它的「所以然」,這就是理這樣的理因為對應現實的事物而發,所以它是多相的,理理不同,但宇宙上基本上是一體的,所有的理推究到極致,它們都是同一種太極的反射,朱子說:這就是「統體一太極,物物一太極」。朱子用「月印萬川」比喻,明月惟一,映到河川,卻成了「千江有水千江月」,江月與天月,是同是異?我們也不妨設想:萬花筒裡的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理」本質上同一,但它又可顯現萬象,但萬象之理也不可少。朱子站在儒家的立場,認為現實事物是有價值的,所以學者不可不負此世的責任,不可幻想「跳出三界外,不落五行中」的快樂風光。但學者也不可以只安於現實的事物之理,不去追求人生的終極境界—這是種天理流行的境界,這樣的境界也是人終極的自我。如何兼顧現實的倫理責任與終極的「統體一太極」之關懷呢?朱子說要「格物窮

理」，與「涵養用敬」，雙管齊下。

「格物窮理」是就任何事物上，體驗出它的所以然之理，此後，學者行事才有依據。窮理窮多了以後，這些理自己會撞擊，會會通，它們的共相（建立在差異中的共相）會越來越明顯。等到有一天格到一個臨界點以後—就像化學實驗的臨界點一樣，意識會有個質的突破—就像化學實驗中的昇華狀態一樣，學者可以體證到一種內外一如的氛圍，這就是「一旦豁然貫通」的境界。

但要體驗到這種最高的境界，單靠格物窮理是不夠的，否則，一位身兼哲學與科學興趣的學者應該很容易豁然貫通，神遊八荒。事實不然，因為衝破有限意識與無限境界，必須意識具足絕對的動力，闖關才可以成功。朱子說：學者必須隨時在心靈上下工夫，保持一種內聚專一的狀態。讀書格物，穿衣吃飯，靜坐調氣（理學家大概都要靜坐），無一不需內心凝聚，這樣的工夫叫作「敬」。敬是種貫穿動靜的概念，我們不妨稱「主敬」為動態的靜坐。

#### （四）

「主敬涵養」、「格物窮理」、「理一分殊」、「性即理」這幾個概念大概是朱子最重要的思想，他將這套思想廣泛的運用到各個文化領域的解釋上去。朱子是中國少數稱得上有「文化哲學」的哲人，但他的文化哲學基本上是性理思想的延伸。等到他的門生、再傳門生以及許許多多的私淑弟子透過講會、書院、書籍印刷將這種理念傳播出去，最後並贏得政府的認可以後，朱子學遂一統天下，成為主流的思潮。

我們如果把這種思潮和隋唐居主流地位的佛老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兩者有類似之處。最明顯的，兩者都有形上的追求，他們都追求一種超越的境界，佛教稱之為「涅槃」，朱子稱之為「天理流行」。現代人不太容易理解朱子說的「理」（太極）到底有何意義？可是對朱子或佛老來說，這是事大如天的概念，它就像猶太—基督宗教的「上帝」之概念一樣，這是安身立命的追求，而且，朱子與佛老都認為：如果學者肯下工夫的話，最後，他一定可以體證得到這樣玄妙的境界。

但朱子到底是儒者，他具備的是華族的心靈，他很難接受緣起性空的解釋，也很難接受佛教的苦業意識以及「世界是顛倒妄想的產物」之基本價值。儒家自始至終是道德意識，而且此道德意識對此世有一根源性的肯定。《易經》有句名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這是儒家最原始也是最徹底的價值選擇。朱子所以要設定「理」的概念，正是要給事事物物合理的說明，這種「合理」乃是本體論的保障，換言之，天下的事物沒有一樣是偶然的，也沒有一樣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們都受「太極」的規範。

「理世界」的提出，劃分了朱子與佛老的不同，但我們也由此看出朱子與早期儒學不同的地方。先秦儒學應該也有心性論與形上學，「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經書時代即已萌芽，《孟子》、《中庸》、《易經》諸書言之尤詳。但無可否認的，先秦儒學的道德意識和人的歷史性、語言性、社會性沒有分開，孔子的「仁」具有強烈的感性的、社會性的、歷史性的動能。如果我們勉強杜撰個用語的話，我們不妨說：先秦儒學的道德是倫理導向的道德，它的廣度深度比高度明顯，朱子學是性理導向的道德，它的高度深度比廣度明顯。

朱子當然不認為他的思想和孔孟有什麼不同，但顯然的，不是所有的儒者都贊同他的看法。陸王就投了反對票，陸王認為「理」不是朱子說的那麼與情感決裂，陸王認為「超越」與「主體」是連續性的。戴震也投反對票，他認為「理」就是「條理」的意思，有事物才有條理，所以「理」是後天的。戴震反朱反的很徹底，他事實上連陸王都反了。

五四以來，朱子學所以大走霉運，此事不難理解。如果「形上的追求」已經變得不重要了，那麼，朱子學還剩下什麼呢？如果「救亡圖存」變成惟一的宗教以後，誰還關心「太極流行」呢？更重要的，如果一種不接受所謂的「理性」約束的「個性解放」成了時代追求的最高價值，那麼，「存天理，去人欲」的呼籲自然會成為可笑的意識型態。

只有等到「救亡圖存」的時代激情以及「蒼白意識之個體性」之追求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以後，朱子學才會再由歷史走入當代的世界，這樣的跡象看來似乎正逐漸的加溫。